



2019年澳大利亚文学及其在中国的译介

多元文化语境下的澳大利亚文学

李尧

2019年

澳大利亚文学秉承其多样性的传统,在保持澳式英语特色的同时,继续吸纳深受多元文化熏陶的各民族作家,创作出一大批优秀的文学作品,在世界文学的大舞台形成一道独特的风景。据不完全统计,从2018年到2019年,仅获得各项重要文学奖的作品就多达40余部。而少数族裔作家和他们的作品出版、获奖,成为一大特点和亮点。

2019年获得澳大利亚最高文学奖——迈尔斯·富兰克林文学奖的是原住民作家梅丽莎·卢卡申科的《多嘴多舌》(Too Much Lip)。这部小说以鲜活、犀利,又带有黑色幽默的笔触,描绘了澳大利亚原住民当代社会的生活,以及原住民文化与传统激烈的碰撞,无情地鞭打了殖民主义统治,为原住民争取权利呐喊,其主题在跌宕起伏的情节中得以深入表达。此次获奖使得梅丽莎·卢卡申科成为澳洲文学史上第三位获此殊荣的原住民作家。作家出版社及时引进该书版权,并请澳大利亚悉尼大学著名翻译家韩静教授翻译,将于2020年出版。斯里兰卡裔作家米歇尔·德·克雷瑟则获得了2019年新南威尔士州长文学奖,获奖作品是长篇小说《未来的生活》(The Life to Come)。华裔作家郑素莲的小说《陌生人的房屋》(Room for a Stranger),马来西亚裔作家许莹玲的短篇小说集《资本失格》(Capital Misfits)、《轻小奇事》(Portable Curiosities)都受到广泛关注和好评。许莹玲希望她的作品“以外来者的眼光对所生活的世界做出更多样化的评价”。她的希望充分显示了澳大利亚多元文化社会生活对不同文化背景的作家的影响,以及在他们作品中折射出来的绚丽光彩。2019年,澳大利亚还第一次以中英双语形式出版了社会小说《多毒妻》(The Poison of Polygamy)。这部书的出版充分显示了多元文化在澳大利亚正以不可抗拒的力量,推动社会与文化的发展和进步。《多毒妻》是华裔澳大利亚人黄树屏于1909—1910年在澳大利亚华文报刊上连载的小说,是华人在澳大利亚,也是在西方世界发表的第一部中文小说。该书讲述了华工在澳大利亚、妻子留在中国的故事,带有浓厚的自传色彩,但也深刻地反映了100多年前澳大利亚的历史、社会和文化环境,是澳大利亚文学史上第一部独树一帜的小说,具有非常特殊的意义。该书的译者伊利·芬奇(Ely Finch)挖掘、翻译这部被历史淹没了100多年的作品,为研究中澳文化交流史作出重要贡献。由韦敏和韦斯理母子共同创作的用中文构思、2019年在中国出版并首次发行的澳洲历史小说《兰花楹》则辟蹊径,为澳大利亚的多元文化增加了一抹亮色,在澳洲文坛引起反响。

活跃在中国的澳大利亚文学研究和翻译工作者准确地把握了这一特点,近年来,把更多的目光投向澳大利亚少数族裔特别是原住民文学的创作成果。2019年,青岛出版社推出“澳大利亚原住民儿童文学汉译丛书”。这套丛书由内蒙古师范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武海燕、陈建刚主编,共收入8位原住民作家创作的10部儿童文学作品,是国内首次比较系统地介绍澳大利亚原住民创作的儿童文学作品,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澳大利亚原住民儿童文学创作的风貌。其中布鲁斯·帕斯科、梅丽莎·卢卡申科、萨丽·摩根都是澳大利亚当代著名的原住民作家。和许多原住民作家一样,作为20世纪六十年代出生、成长起来的一代新人,他们都是为本民族利益奔走呼号的社会活动家。儿童文学只是他们政治生活与文学创作的一部分。正因为这样,这些作品不但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而且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海马号》(Seahorse, 2015)、《狐狗福格》(Fog A Dox, 2012)、《惠特拉夫人》(Mrs. Whitlam, 2016)、《杀死达西》(Killing Darcy, 1998)、《巴拉姆比的顽童们》(The Bar-rumbi Kids, 2002)、《会飞的鸚鵡及其他澳大利亚故事》(Sally Morgan, 1997)等都从澳大利亚原住民独特的视

角出发,深刻地揭示了当代澳大利亚面临的人与大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与斗争。这些着眼于今天的故事又无不折射出几百年来澳大利亚原住民悲惨辛酸的历史以及这一段历史在他们心中留下的阴影。然而,饱经磨难、善良真诚的原住民在为捍卫自己的权利不懈斗争的同时,又始终怀抱美丽的梦想,希望解开历史谜团,希望实现民族和解,希望人与大自然和谐相处,希望这个世界充满爱、充满阳光。因而,这是一套充满正能量的、启迪儿童也鼓舞成人的好作品。

亚历克西斯·赖特是当代澳大利亚最著名的原住民作家。她的代表作《卡彭塔利亚湾》(Carpentaria, 201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李尧译)获迈尔斯·富兰克林文学奖后,赖特又撰写了长篇小说《天鹅书》(The Swan Book)。这部重要著作与堪称民族史诗的《卡彭塔利亚湾》比肩而立,由李尧、李平翻译,即将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小说情节扑朔迷离,集诗歌、散文、民间故事、政论文等多种体裁于一身。对大自然的描写出神入化,对天鹅的刻画美妙绝伦。《天鹅书》的故事发生在未来100年之后的澳大利亚北领地。小说中的哑女幼年遭到三个吸食汽油的少年轮奸,之后跌入桉树根下的洞里沉睡,10年后被白人老妇人贝拉·多那救起。女孩不会说话,不被族人接受,贝拉把她养大,每天给她讲天鹅故事。善良的贝拉喂养老湖的天鹅,她死后,哑女与天鹅相依为命,被称为“天鹅女”。“天鹅女”具有象征意义。作为一个无辜的弱小者,她遭受暴力之后不再说话,也渐渐失去了说话的功能,这与澳大利亚原住民几百年来遭遇如出一辙。作者之所以选取哑女作为原住民的象征,是因为她相信,他们根本无法发声。哑女与人类社会隔膜,却和天鹅相依为命,象征着原住民与大自然的紧密联系。

《天鹅书》可谓关于天鹅的文学作品之大全。天鹅——未来世界的先知(柏拉图的《斐多篇》)、垂死天鹅之哀鸣(英国诗人丁尼生的《垂死的天鹅》)、丑陋城市里天鹅对雨水和故乡的渴望(波德莱尔的《天鹅诗——献给维克多·雨果》)……这些有关天鹅的意象和观念都在《天鹅书》中得到再现。爱尔兰诗人W.B.叶芝在其名作《丽达与天鹅》中讲述丽达被幻化为天鹅的宙斯强奸,天鹅幻化为天鹅座。而遭强暴生下来的女孩海伦成为特洛伊战争的导火索,导致古代世界毁灭。这个神话赋予了《天鹅书》中原住民女孩被强暴的故事以深刻的意义。《天鹅书》中还运用了大量有关天鹅的童话和民间故事,比如安徒生的童话《野天鹅》、E.B.怀特的儿童成长寓言故事《吹小号的天鹅》、爱尔兰民间故事、亚洲民间故事和古诗等等。另外,小说还指涉瓦格纳的浪漫歌剧《罗恩格林》、柴可夫斯基的舞剧《天鹅湖》等。世界各国诗歌和文艺作品中对天鹅精彩的描述,如天鹅的绝唱、天鹅的痴情、天鹅舍身救人等等,在赖特的笔下都与原住民的生活紧密地融合在一起。对天鹅的绝妙描写,使得赖特这部小说与世界文学经典形成对话。

《地平线上的奥德赛》(Odyssey of the Horizon)是亚历克西斯·赖特的最新力作。这本书由李尧和日本翻译家有满保江合作翻译成中文和日文,连同英文原文本合集,近期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和日本现代企画出版社同时推出,是中日合作出版的新模式。《地平线上的奥德赛》是寓言,是散文,也是诗。该书描绘了1788年,英国“幽蓝船”穿越地平线,入侵悉尼湾的那一刻,描绘了暴力殖民创伤性记忆“深入到未来几代人的噩梦”以及“世界历史上数以百万计饱受战争摧残的人”的迁徙,包括今天在澳大利亚寻找新家的无数难民儿童。这些经历在赖特的散文中相互交织,在诗歌和故事的蒙太奇中不断重叠,密不可分。作者所说的“历史的悲哀”在人类的神话中回荡,就像古希腊诗人荷马的“奥德赛”在21世纪依然延续。

与此同时,澳大利亚的文学经典与历年来的获奖作品依然是我国译者与出版社关注的重点。2019年12月,浙江

文艺出版社推出1973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帕特里克·怀特的代表作《风暴眼》(The Eye of the Storm, 朱炯强等译)、《人树》(The Tree of Man, 胡文仲、李尧译)、《树叶裙》(A Fringe of Leaves, 倪卫红、李尧译)。2019年,《世界文学》第6期发表了澳大利亚文学开山鼻祖、著名作家亨利·劳森(Henry Lawson)的短篇小说《给天竺葵浇浇水》(Water Them Geranium, 张加生译)。外语教育与研究出版社即将出版中国读者熟悉的澳大利亚著名作家托马斯·肯尼里的长篇小说《耻辱与俘虏》(Shame and the Captives, 李尧、刘洋译)。这是一本源自1944年震惊澳大利亚的日本战俘越狱事件的历史小说,揭露了战争的残酷,颂扬了人性的光辉。李尧和刘洋还合作翻译了肯尼里的布克奖、金棕榈奖提名作品《吉米的颂歌》(The Chant of Jimmie Blacksmith)。这本书源于真实的犯罪事件,讲述了澳大利亚原住民遭受的苦难与压迫。肯尼里的《战争的女儿》(Daughters of Mars, 解村译)则是一首比《辛德勒名单》更动人的坚不可摧的战地玫瑰颂歌。2019年,文化发展出版社出版了享誉世界的《荆棘鸟》(The Thorn Birds)的作者考琳·麦卡洛的《罗马主宰》系列丛书第五部《凯撒》(Caesar, 沈英译)。2019年10月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罗伯特·麦克林的《黑暗天堂》,译者苏梯平、吉文凯。故事始于詹姆斯·库克船长发现福克岛并在那里殖民拓居,止于21世纪的詹妮尔·巴顿凶杀案。时间跨度长达220年。麦克林通过大量史实、日记、档案揭露了一段被刻意掩盖的黑暗、血腥、残忍的殖民历史及其带来的罪恶和混乱,把原本散落在浩如烟海的史料、档案、书信、日记中的碎片拼接成一个完整而触目惊心的故事。作家出版社还将于近期出版2019年澳大利亚总理文学奖获奖作品《诺亚之死》(The Death of Noah Glass)。该书由盖尔·琼斯创作,李尧翻译。这些澳大利亚文学经典的出版对中国读者更好地了解澳大利亚的历史文化、风土人情,走近澳大利亚必将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魅力无穷的澳大利亚儿童文学,依然深受中国小读者的喜爱,为此,北京联合出版公司于2019年推出“澳大利亚儿童文学经典”系列丛书,包括多萝西·沃尔的《眨眼睛的比尔》(The Complete Adventures of Blinky Bill, 刘勇军译)、诺尔曼·林赛的《神奇的面包》(The Magic Pudding, 李尧译)、梅·吉布斯的《梭宝宝和梭贝贝》(Snugglypot and Cuddlepip, 李尧译)。

对澳大利亚文学的评论在2019年也有了较大的发展。马丽莉不但在2018年翻译出版了澳大利亚有华人血统的著名作家布莱恩·卡斯特罗的《园书》(Garden Book),还在《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发表了《试论〈园书〉的反种族主义主题》。这篇文章通过对小说的研究,指出种族主义者的自我仇恨、白人至上的权力关系、白澳政策的阴魂不散是种族主义的主要根源。由梁中贤、赵祥凤主编的《澳洲后现代文学中巾帼——伊丽莎白·乔利文集》(青岛出版社)探讨了乔利的生平与创作的关系,探究了乔利作品的“怪诞”之风,阐述了乔利对多元文化语境下的生存探索,研究了乔利小说中的自我救赎、人性尊严以及获得迈尔斯·富兰克林文学奖的《井》的主题及艺术特色,是一本研究澳大利亚文学很有深度的专著。韩竹林的《格兰·菲利普斯诗歌及其翻译研究》(青岛出版社)以澳大利亚诗人格兰·菲利普斯的诗歌为研究对象,从诗人人生经历与诗歌创作的关系、生态诗歌研究、爱情诗歌研究、视觉诗歌研究和诗歌译介研究五个角度系统解读了格兰·菲利普斯作为诗人如何超越个人、民族、文化和现实的局限,使他的诗歌创作进入新的境界。作者还揭示诗人如何以关怀人类生态文明、关注积极人生哲思、视觉冲击与内涵张力通融的视角,彰显了多元文化的价值取向,从而推进澳大利亚诗歌走向国际的审美动因。

《女性时代》:女性的“苦难”书写与创伤复原

闫吉青

20世纪90年代以来,“女性作家群的形成与女性文学的崛起”成为当代俄罗斯文学的一个亮点,女性作家希冀用女性独特的观点——女性独特的文化立场来赢得女性在历史言说中的权力,书写几百年未被揭示的女性生命体验。2009年“俄语布克奖”得主奇若娃就是其中值得关注的女作家之一。叶莲娜·奇若娃(Елена Чижова)是当代俄罗斯著名作家,其作品《男大寺院》和《女犯人》先后入围2003年和2006年“俄语布克奖”短名单,《女性时代》荣膺2009年“俄语布克奖”。

《女性时代》以作者本人的亲身经历为基础,叙写了几代俄罗斯女性在20世纪社会动荡、风云变幻的时代大背景下所经历的不幸遭遇和命运。记忆是历史的基础,历史正是藉由记忆,将已经消失的过去保存下来,并定格为永恒。正如张隆溪所言:“一个有悠久历史的民族必然是重视记忆的民族,无论是个人记忆还是集体记忆,无论是愉快或者痛苦的记忆,也无论是积极开放的或受到压抑而隐秘的记忆,都是记忆链条的环节,而历史也就有赖于这记忆的链条。记忆的链条断裂,历史也就断裂了。要恢复历史,就必须修复并且保存那记忆的链条。”奇若娃将一向被历史淹没的社会底层女性群体重新置入公众的视野当中,让一向失语的俄罗斯女性在新的时代重新发出自己独立的声音。小说语言平实,叙事手法独特,感情真挚,内蕴深刻。笔者将从女性的“苦难”书写与创伤复原两个层面切入,对作品进行解读与剖析。

故事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苏联的一座公寓里。安东妮娜是从农村被招募到列宁格勒的青年女工,在一次乘车过程中邂逅知识青年格里戈里,两人之间有过一段短暂的交往,后因思想观念、城乡差异等原因而分道扬镳,留下一个不期而至的小生命——小女孩秀赞娜。秀赞娜身体孱弱,经常生病,且患有哑症,7岁之前一直都不会说话。安东妮娜既要照顾孩子又要工作,忙得焦头烂额,身心俱疲。这时,同住一所公寓的叶夫多基娅、格利克里娅、阿里阿德娜三位老人主动伸出援助之手,自愿承担起照顾和培养秀赞娜的任务。她们秘密地给她进行了洗礼,洗礼后的名字叫索非娅。安东妮娜被超负荷的工作折磨得筋疲力尽,不久便罹

患癌症撒手人寰。三位老人费尽周折,得以继续抚养和教育索非娅,后者长大后成为了一名杰出的艺术家。

女性的“苦难”书写

叶夫多基娅、格利克里娅、阿里阿德娜三位老人在缓缓的回忆中,叙述着女性个体受的伤痛和生命的悲苦,展示了三位老人各自迥异的复杂人生经历。第一次世界大战、二月革命、十月革命、农业集体化、大清洗、第二次世界大战、冷战等20世纪一系列重大的社会历史事件在老人的叙述中若隐若现,反复被提及;同时,作家通过对几位女性日常生活的描述,再现了20世纪60年代苏联的历史。三位老人身世坎坷,她们出生于沙皇时代,在战争中失去了丈夫、儿女、情人,“没有任何亲人。丈夫和孩子都失踪,去世了。连孙子们也不在人世”。三位老人孑然一身,颠沛流离,家破人亡,身体羸弱,但她们依然顽强地生活在赫鲁晓夫时代。

看似平淡的日常生活中浸透着她们生命的挣扎与孤独,三位老人承受着心灵的痛苦与精神的寂寞,遭受着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她们忍辱含悲,历尽艰辛,孤立无援,那种丧失亲人的痛刻骨铭心,一直难以忘怀。尽管如此,三位老人依旧豁达乐观地对待生活,她们没有怨天尤人,也没有一味沉溺于苦难的叙述,而是以略带自嘲的口吻力图淡化苦难给她们带来的痛苦与创伤。相似的遭遇和同病相怜的命运将她们连结在了一起,在常人无法想象的痛苦中,她们尽己所能,给予单身母亲安东妮娜以物质和精神上的帮助与慰藉。

别尔嘉耶夫曾经说过:“俄罗斯文学不是诞生于喜悦的创造力的过剩,而是产生于个人和人民命运的痛苦和苦难,产生于拯救全人类的探索中。”《女性时代》正是这样一部关于女性“苦难”述说的文学作品,更具体说来,是关于20世纪上半期苏联生活以及生活在苏联制度下不同年龄段的女性的生存故事。小说通过几位俄罗斯女性刻骨铭心的生存之痛折射出历史之痛,通过个体生命的悲惨遭遇与苦难命运的书写,沟通了与历史的对话,让凝固的历史事件在女性的记忆里复活,凸显出沉重的时代在女性生命中心留下的永恒创伤与印记。

创伤复原

重拾亲情是三位老人走出创伤阴影的一大法宝。由于战争期间亲人的相继亡故,老人们遭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悲伤,不幸成为动荡岁月中被时代遗弃和孤立的女性形象群体,经历了人生路上令人窒息的苦难和残酷的爱情,其身心被时代的风雨蹂躏得千疮百孔,饱受多重创伤的折磨。她们过着几乎与世隔绝的生活。自从开始照顾索非娅之后,老人们丢掉了往日的孤独、痛苦和忧伤,不但享受到了亲情,而且刷新了自己的存在感与成就感。作品聚焦几位女性洗衣、做饭、排队购物、照顾孩子等这些庸常的生活琐事,使得她们的故事更多了几分安详与从容。在这一缓慢行进的历史文本中,作者将温暖的温暖赋予这几位顽强而柔韧的女性。但在其灵魂深处仍然保存着人性最温暖最神圣最善良最美好的部分,不失女性的善良与坚韧,没有悲观,更没有绝望,始终坚持着对生活的善意,在苦难中抗拒命运,捍卫尊严。她们相互激励,互相汲取生存的热量,温暖彼此孤寂的心灵,让人性的温暖点亮纯洁的精神灯塔,人性中善的力量从此消弭了恶的存在。几位来自不同阶层、有着迥异的背景的人组建了一个新的家庭,她们三代人延续着一段活着的历史,是时代的代表、时间的见证。不同的命运于此交汇,新生的希望之火点燃了早已在苦难中冷却的心灵,她们都被冠以一个相同的称名:女人。

由于社会地位和文化修养的巨大差异,几位女性的价值取向、知识结构、思维方式不尽相同,但其基本的价值尺度和道德准则却是惊人地相似:她们性格乐观、开朗豪爽、敢作敢为、乐于助人、勇于承担。三个老太太的退休金加上安东妮娜的工资,是她们全部的生活来源,生活相当拮据,尽管如此,但她们对生活没有绝望,没有诅咒命运的不公,更没有一味沉溺于悲伤之中。相反,她们精神饱满,积极活跃,办事果断,将全部的爱都倾注到小姑娘身上。自从答应照顾索非娅之后,老人们的生活变得更加单纯而快乐,她们生活中唯一的聚焦点便是如何最好地为索非娅营造一个温馨幸福、无忧无虑、童话般美好的成长氛围。她们更

关注于日常生活的细节中撷取记忆,挖掘自己内在的体验和情感。衣服、玩具、线团、新年枞树等都成为作者用来投射老人们感情的事物。

当时苏联币制的改革,老人们的退休金愈发贬值,为了让索非娅能够吃好穿好,外婆们节衣缩食,精打细算,以满腔的爱心和独特的智慧为原本艰辛灰暗的生活涂上了一抹亮色,让这个温暖友爱、浪漫温馨的三口之家成为几位饱经生活磨难的女性的疗伤之地。

从小姑娘的爱心付出,使得她们在艰难的生活中找回了亲情和希望。亲情的魔力与爱的滋养是支持老太太们重新开始新生活的重要力量,对索非娅的爱成为她们对这个世界唯一的感情寄托。关注当下幸福体验,努力使自己的生活在充实起来。在这种积极心态的支配下,她们教索非娅认字、读书、绣花,给她讲故事,陪她散步,带她去剧院看戏。她们没有沉溺于自己生活中悲惨的一面,对于过往的创伤性经历没有一味怨天尤人,而是用轻松愉快的心态直面生活中的各种不幸和遭遇,尽可能地给自己寻找生活的乐趣,以往生活中那些悲伤与不快,似乎烟消云散。

透过几位女性形象的塑造以及她们彼此之间的互动,作品展示了生命传承背后一种高贵的力量——爱的力量。这种顽强的爱的力量是一种生命延续与情感相通的联结,“它未必强大,但足以抵御外界的风雨;它未必张扬,但足以带来内心的抚慰;它的柔软守护着女性生命最后的光明,坚守着时间将赐予后代女性的最终公正”。

“一个背负起历史重负与反思责任的作家,一部展示出沉重的历史背景中个体生命的彷徨、困顿、挣扎或者说以肉身背负起其全部记忆的作品,将必然具备历史苍茫醇厚的韵味与人性深邃丰满的内质,并以此建立起其经久不衰的美学特性。”作为一个具有历史反思精神的作家,奇若娃在对“小写”历史的叙述中,实现了对时代的批评认知与人性深度挖掘的完美统一。历史是深邃厚重的时空体,个体生命总是不断地被卷入到对新的历史洪流的塑造中去,在历史与时间面前,没有性别的差异,没有年岁的隔阂。相互扶助提携的人的身影蹒跚走进历史的深处,而彼此创造的温情则克服了时间的短促,成就了记忆的永恒,并最终成了历史内核的真正载体。叙述历史的话语在新与旧的时代交割之中,在生与死的轮回往复之中,在苦难与爱意的纠缠下愈发明晰,愈发响亮。所谓女性时代,并不是只属于女性的时代,而是女性作为历史的一个不可缺少的主体而存在的时代。

